

## { 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之 2 }

苏联的出现和兴起是凯歌式的，无论对于过去的世界还是对于未来的世界，它的凯歌总是值得颂扬的；而苏联的没落和解体是悲壮的，其悲壮就在于它败于不该败、亡于不该亡。无论岁月怎样流淌、怎样消逝，对于苏联历史的评述总是不会停止下来的，因此怀疑、探索也就永远不会止息。

闻 一〇 著



# 凯歌悲壮

KAIGE  
BEIZHUANG

江西人民出版社

## { 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之 2 }

苏联的出现和兴起是凯歌式的，无论对于过去的世界还是对于未来的世界，它的凯歌总是值得颂扬的；而苏联的没落和解体是悲壮的，其悲壮就在于它败于不该败、亡于不该亡。无论岁月怎样流淌、怎样消逝，对于苏联历史的评述总是不会停止下来的，因此怀疑、探索也就永远不会止息。

闻 一◎著



# 凯歌悲壮

KAIGE  
BEIZHUANG

江西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凯歌悲壮/闻一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6.6

(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2)

ISBN 7-210-03376-9

I. 凯... II. 闻... III. 苏联-历史 IV. K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5813 号

一个历史学家眼中俄罗斯之二:

凯歌悲壮

闻一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23.25

字数:470 千 印数:1-5000 册

ISBN 7-210-03376-9/K·435 定价:39.00 元

---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E-mail:jxpph@163.net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闻 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 主要著述：

《苏联的过去和现在》（战士出版社）1980年。

《布哈林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

《苏联史纲》（1917—1937）（合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

《苏联史纲》（1953—1964）（合著，人民出版社）1996年。

《世界史通俗演义：现代卷》（合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

《走近俄罗斯》（三联书店）1997年。

《解体岁月》（《俄罗斯情结》三部曲之一，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

《谁为领袖谋划》（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年。

《俄罗斯大特写》（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

《重返莫斯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山外青山》（青岛出版社）2000年。

《俄罗斯深处》（《俄罗斯情结》三部曲之二，北方文艺出版社）2001年。

《回眸苏联》（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

《绝色，俄罗斯》（台湾书林出版公司）2003年。

《苏联的工业化：历史、经验、问题》（译著，商务印书馆）2004年。

《走近伏尔加河》（黄河水利出版社）2006年。



策划组稿：朱卫东  
 责任编辑：曾熙  
 特约编辑：张国功  
 版式设计：蔡二弘  
 装帧设计：柏拉图工作室

## 《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总序

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发展是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的，俄罗斯的历史是扑朔迷离、五彩缤纷的。在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这种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全交织在上演这出壮阔戏剧的人物的思维、言语和行动中；这种扑朔迷离、五彩缤纷齐集于推进这种种声威俱下的事件的运筹、决策和实现里。无论是人物还是事件，它们总是那样声情并茂，勃发于天马行空之势，通行于凯歌冲锋之阵；即使销匿，也销匿于壮怀激烈之色。

因此，一部俄罗斯史、一部俄罗斯国家的发展史本来也就应该是声情并茂、五彩缤纷的。它应该是有活的人、活的思维、活的行动、活的事件的自始至终的全过程，或者说，在我们后人复述、再现这一历史时，千年的人和事应该活在我们的文字语言里，应该活在我们的思维、推理和结论之中。而遗憾的是，我们的不少对俄罗斯历史的复述和再现的文字却是枯燥的、贫瘠的。其所以枯燥，是因为在这些复述和再现的俄罗斯历史中，只有一些被精制得尺寸分明的条条框框，只有一些新鲜得不能再新鲜的词语口号；其所以贫瘠，是因为在这些复述和再现的俄罗斯历史中，除了预先想好的或者被预先规定出的结论外，就是不厌其烦的引语，领袖的话、前人的话、权威的话、他人的话，而就是没有自己的话、自己的思维、自己的结论。

不知什么时候起，我们的论著全按照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模式来制作了。先定下几个结论性的意见，再用政策方针来做基础，最后去筛选一些或者拼凑一些历史事实来填补几个结论间的空间。于是，一部浩然大作就成了。在一些人看来，不这样作文，不这样做历史，就是不严肃的；历史嘛，就是为了总结经验，就是为了教训人的。于是，历史就变得森严起来，历史就成了厚厚的一沓纸上的空话，历史成了工具、手段、指示、命令，甚至仕途的台阶，成了所有可能成为的一切而偏偏就不是历史的东西。

历史论著的长短本不是一种表明这种论著科学性高低、贡献性大小的标准。可现实生活中就有那么一些死规定：5000个汉字以下的文字不能算论文；描写了人物和情节的文字不算科学，而叫做“通俗文章”。甚至，权威学者们还要花费无数的精力来界定这种“通俗文章”，界定什么是“通俗文章”、什么人去写“通俗文章”。而一切界定中最令人望而生畏的界定，就是“通俗文章”是不能作为科学考核的依据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厌烦了这种森严的、只有结论的历史。1997年,早在《走近俄罗斯》一书的序言中我就写过:“不知为什么现在的史学文章写得越来越枯燥,越来越没有文采,越来越叫人不耐烦去读。我自己的史学文章也是这样。似乎还有一个令人无法理解的现象,那就是一些写得有趣的,生动的,有文采的,常常被冠以‘普及读物’的好听名称,而被打入史学文章的另册。一些史学同行宁肯被大块大块的史学文章憋死,也不愿屈尊于‘普及读物’的‘雕虫小技’,期盼着有朝一日史学家的尊号落到头顶时不会为往昔的平庸而羞愧。而我喜欢色彩和情趣,希望史学和文学的融合。”我也喜欢平凡,喜欢平庸。不过,这句话在那时我没有写。

从《走近俄罗斯》起,我便离开森严和神圣,走上了一条平凡的、平庸的、被许多人认为注定了不会有光环的史学研究和写作道路。10年过去了,用得上一句老话,岁月如飞。我不再写那些严肃的论著,所谓严肃,我一是指那些什么可写、什么不能写的界定;二是指那些先验性的条条框框;三是指那些烦琐的注释,那些比论著本身都要长出去许多倍的、表明自己知识是如何渊博、资料是如何可靠、引证是如何权威的注释。当然,我并不是笼统地不写论文,我只写我根据历史事实必须写的东西,我只写令我不写则不能心静的东西,我不再用那些庞大的、几乎要吓死人的注释体系去让读者烦恼。收集在这套书里的论文集《凯歌悲壮》就证明了我既在森严的、神圣的“学院派”氛围中从事过不通俗的研究,也证明了我从这个氛围中的走出。而我可以告慰我的读者的是,几十年过去了,我的一系列论文中虽都不同程度地留下了时代的烙印,但我写的是真话,我所追求的是尽可能地去接近历史真相。

这几年来,我一直在说,现在还想说的是,历史论著不能板着面孔,因为历史本身就不板着面孔。历史需要活的气息,需要活力,需要色彩,因为它本身就充满了活的气息、活力和色彩。《走出北高加索》是一本试图用活的气息、活力和色彩来描述北高加索和俄罗斯的历史和现实的书。在这个我用形象、感情、甚至呼号和悲叹的文字组成的书中,一切都是跳跃的、波动的、变幻的,一切都有各自的形象。无论是人物,还是事件,它们都穿越于过去和现在之间,它们都飞腾在苍穹和大地之间,它们都思考在存在和否定之间。我要说的是,《走出北高加索》不是纯粹的游记,也不是好事的文人们所宣扬的“行走文学”,尽管读者可以在这些文字里看到山山水水,有目的愉悦,有耳的声响,有心的情感。

任何历史都有可以颂扬的一面,也有需要评析,甚至否定的一面。颂扬是为了历史的前进,而评析和否定也是为了历史的前进。没有只在一片颂扬声中的历史;也没有因为评析和否定就会颠倒了历史,并进而会将历史前进的方向引向歧途的事。苏联的历史同样是这样。我在《回眸苏联》一书中说过:“过去,人们对苏联的历史之‘正’已经说得很多,很深刻,很系统,很有理论水平,而恰恰是对苏联的历史之‘反’没有说透,甚至讳莫如深。造成苏联解体的恰恰不是苏联的历史之‘正’,而是它的历史之‘反’。尤其是当这个庞然大国已经不复存在时,尤其是在当俄罗斯

已在按照新的方式前进和发展时,探讨导致苏联最终解体的‘反’,就是极其重要的事。仅仅把苏联的解体归罪于戈尔巴乔夫一人,这是最容易,也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但苏联历史之‘反’却要复杂得多、深层得多。‘反’之不识,又何以识‘正’?‘反’之不除,又何以求‘正’?人们总是喜欢‘正’,而忌讳‘反’。而历史学家的使命偏偏是要在‘正’、‘反’之中求真理。”

在《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中,应该说我探讨的全是苏联的历史之“反”。我的着眼点首先就在于探究“反”中的恶,并试图从这种近乎无情的反思中寻求到一种历史如何不再坠入此“反”中,不再为此“恶”所左右的实质。因此,这本书的文字是犀利的,甚至不仅仅是批评和批判,而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抨击性质。现在,人们已经不习惯“抨击”这个词,似乎它只能是用于否定的意义上。但是,我觉得,对于历史前进过程中的那些“反”、那些“恶”,即使是在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也需要抨击。因此,这本书中的文字更近乎杂文,但是它们都是以严格的事实为依据的。同样,现在人们也不大愿意说“杂文”这个词,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只需要歌颂,也不需要揭露,因此唇枪舌剑的杂文应该被淘汰。而我说,为了正确认识苏联社会主义的兴衰,为了历史的前进,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是需要杂文的。

《走出北高加索》延伸了我在《走近俄罗斯》、《俄罗斯大特写》、《重返莫斯科》和《绝色,俄罗斯》中对色彩、文采的追求。它从另一个角度,以另一种文字描述了俄罗斯的历史和现实;《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则继续了我在《山外青山》和《回眸苏联》中的批判精神和现实主义追求,它同样也在色彩和文采上尽可能地下了工夫。总之,我从多方面考察了俄罗斯的历史和现实。这个多方面融合了学院派的严肃、学者的探求、文人的情意,甚至还有旅游观光者的闲适和安逸、酒后茶余的侃侃而谈。于是,所有这些文字就组成了我眼中的俄罗斯,一个较之单纯的论著要多彩得多、丰富得多、有趣味得多的俄罗斯。而这个俄罗斯,我认为确是一个现实的俄罗斯,一个我们需要去更深入了解的俄罗斯。

我将继续我的对色彩和文采的追求,我将继续我对俄罗斯多方面、多角度的考察。同样,我也将继续我的平凡,我的平庸,我的被一些人认为注定了不会有光环的研究和写作的道路。

闻 一

2006年春花烂漫时于北京南横陋室



## 序

1953年,当我还是一个意识朦胧的初中生时,我就曾为斯大林的去世流下了眼泪。我记得,那是清晨在学校的运动场上,照例是中央电台的新闻广播。突然在悲怆的哀乐声中传出了斯大林去世的消息。站在那里,我情不自禁地流泪了,而且泪水潸然而下,竟然是控制不住的。其实,那时我远远不知道苏联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斯大林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我所知道的,都是报纸和广播里所宣传的,所以,从我幼小的心灵中早就升腾起一种渴望,要去看看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异想天开地要去看看这个伟大的斯大林。而现在斯大林不在了,这个愿望就无法实现了。现在想起来,大概,当时我更多的是为这个原因而流泪。这是我对现实的苏联和神话般斯大林的一种朦胧感情的流露,而不是面对苏联的历史。

又过了几年,当新一代苏联领导人走马灯似的来往于莫斯科与北京之间时,我又一次为苏联和苏联领导人而兴奋。记得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当赫鲁晓夫来北京访问时,我正在北京俄语学院学习。那时,正是苏联第一个人造卫星上天,加加林缔造了一个神话,而赫鲁晓夫成为“宇宙之父”的岁月,所以赫鲁晓夫的来到北京和他有可能来到我们这个学院的猜测,令我们这些年轻人朝思夜盼,结果是连赫鲁晓夫的影子也没有见着。当伏罗希洛夫来京时,我有幸被选为去欢迎伏罗希洛夫的队伍中的一分子,就为了在见到他时高呼一声“欢迎”,我们好几天都扯着嗓子练叫喊:“伏—罗—希—洛—夫!”结果这位领导人也只是在我们面前一晃而过。这同样是对现实的苏联和苏联领导人“群起效应”般感情的流露,而不是面对苏联历史。

再后来,中苏之间的分歧见诸报端,那正气十足、火药味也十足的“九评”将一个曾竭尽全力宣传和神化的苏联和中苏友好在瞬间化为尘埃。于是,一切都颠而覆之,在普通人的心中、眼里,苏联成了霸权和修正主义的代名词,而苏联领导人则成了睡在身旁的居心叵测的老虎。我感到茫然,感到是非错位后的十字路口的困顿。然而,这也只不过是身不由己者旁观时事时的一种感情流露,而不是真的面对苏联的历史。

在那个喧嚣一时、动乱不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知识不吃香,而用俄语字母标示的知识更不吃香。在工军宣队声威俱下的“改造”中,在工农群

众火热的“再教育”过程中,在经过那场从人到桌椅板凳都“战略搬迁”的伟大行动中,我曾较之他人有更多的机会被指定去农村、农场,车间,去接受他人在短期内就可完成的“劳动任务”。后来,我终于被安排到图书馆工作,但那里的人们又不愿我去插手编录书目。阅览室晚间对学生开放,但苦于没有人值班,于是我自告奋勇地去值班。我人在异地异乡,又无锅碗瓢盆之累。我去值班,既解放了那些因妻儿锅台而不愿值班的人,又方便了我自己,何乐而不为!我说方便了我自己,是因为我看上了图书馆的书。当学生们纷纷攘攘在阅览室坐下后,就是连续寂静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这段时间,我就能坐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看书。这是何等宝贵的时间啊!这是一个特殊的岁月,是一个将书籍分为不禁之书和必禁之书的年代,是一个将知识分为可以为某些人所用来和不能为某些人所用的岁月。我在图书馆这个屋檐下看了许多的“禁书”,接触了相当多的有关苏联的书籍。这是我人生经历中的一次幸会,一次在普遍浮躁的大环境中静下心来,重新渴求知识的难逢机遇。然而,这还不是我真正地面对苏联的历史。

后来,水电部在一位首长的指示下决定翻译列宁亲自领导并参与编制的《全俄电气化计划》。转告我们的话是:“列宁说它是伟大的计划,是计划经济的开端。列宁文集上写了不少,可就是没有人见过全俄电气化计划的文字。翻译出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被找去参加这一计划的翻译工作。对于他人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这次翻译对我来说,是一次标志性的转折。经过这次翻译工作,我较之他人,甚至是后来成了我的同行的我国苏联史研究者,最早地阅读了这个计划的全部文字,我进而进入了列宁文字的世界。这是我真正面对苏联历史的开始。

而这首次面对却使我想到一个问题: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两点间最短距离”的直线计划?为什么这计划里具有一种凯歌式行进的精神?这只是个疑问,没有人能回答我。因为只是疑问,所以还谈不上怀疑。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后,我先后在《世界史知识》和《世界历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工作过。汇集到这里的有关苏联历史的疑问逐渐增多,于是我的目光就日复一日地专注并停留在了这个疑问逐渐增多的苏联历史之上了。

而且不仅仅是疑问,已经是怀疑了。我最早的,也是第一个对苏联历史的怀疑就是:既然列宁自己都说“战时共产主义”方式是错误的,而且这错误是包括列宁本人在内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所犯的,为什么纠正“战时共产主义”错误的新经济政策执行起来竟是如此的艰难和充满曲折与斗争?为什么斯大林要把“战时共产主义”的错误说成是布哈林等人的罪过,并且要用自己的“直接工业化”和“新的新经济政策”来替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由是,我怀疑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是否正确,是否如在他亲自领导和参与下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说的那样。进而我发觉了列宁对于一系列问题的评说竟然和这本被推为无产阶级革命金科玉律的书所描述的相距甚远。

怀疑增多,阅读的数量也增多,因此,留在了纸页上的东西也增多。在怀疑、阅读和写作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那就是我有机会接触了苏联解密

档案。当1991年12月,苏联的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中的屋顶之上飘然降落时,那些曾经被苏联执政当局视为机密、绝密、绝密机密的党的、政府的、领导个人的文件通过不同的渠道流向了社会。翻开那一时期的报章杂志,就可看出这种“泄密”的洪流是如何的浩荡、如何的不可遏止。而在这解体岁月里,我正好身处这个国家,并亲身领受了这一解体过程的多面反应。而正是从这时起,从那些几乎发黄的纸页上所传出的信息,令我确信,我的诸多怀疑是有理由成立的,因此在怀疑基础上的探索是立于一种有可靠论据的基础之上的。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期,俄罗斯自发的“泄密”逐渐演变成了俄罗斯的学者和有关机构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有针对性的苏联档案的公开和开放。这种情况对于研究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的人来说,就像是一道深锁的大门被打开,一处处迷宫在九曲盘旋后豁然开朗,剩下的就是需要人们去辨伪、存真,去探个究竟,去弄清事实和是非了。于是,我走进了这道大门,在那些迷宫中滞留不去。

而我的怀疑、探索和写作的过程也就无法中止下来了。终于,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我写下了收在这本文集中的一系列文字(但这并不是我这些年来所有的有关苏联历史的文字,一些已经收集在《山外青山》和《回眸苏联》等文集和书中)。从全俄电气化计划、“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直接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大清洗”、囚犯劳动力、战时经济、赫鲁晓夫的改革和他的下台等,我涉及了几乎是苏联历史发展全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当然,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结论都是我个人的,怀疑也是我个人的。

我怀疑、探索的年代是一个允许怀疑和探索的年代。没有这个大环境,任何个人的怀疑和探索都永远只是个人渴求的、海市蜃楼般的追求。事实上,在这些年代里,对过去写在书本上的和现实中的苏联历史产生怀疑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而是有一批人。我们有一批人在怀疑、探索,甚至默默无闻地伏案读书和写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批研究者是属于怀疑、探索者之列的,或者说,是怀疑、探索的一代。在我看来,做学问,没有怀疑和探索精神,是成不了事的,更不用说成大事了。因此,我现在的这本文集,不仅反映和总结了我个人从事苏联史研究的过程,而且也在某种意义上留下了我们这一代研究苏联历史的人们的足迹。

《凯歌悲壮》,就它的集名而言,它表达了我对苏联历史的全部看法:苏联的出现和兴起是凯歌式的,无论对于过去的世界还是对于未来的世界,它的凯歌总是值得颂扬的;而苏联的没落和解体是悲壮的,其悲壮就是它败于不该败、亡于不该亡。我之所以颂扬是因为我渴求一个公正的、平等的、幸福的社会;我之所以探索、再思考和重述,也全是因为我还是在渴求一个公正的、平等的、幸福的社会。

我想,无论岁月怎样流淌、怎样消逝,对于苏联历史的评述总是不会停止下来的,因此怀疑、探索也就永远不会止息。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把《凯歌悲壮》看成是我的研究的新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点,是打开了又一个思维、探索的阀门,为的是让思考之水再次源源不断地流出来。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打开一道新阀门,就总会有许多的感慨和想法,像泉水般喷涌出来。我曾经写过,每逢这时,我总是很

兴奋,总是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期待,而今又逢5月,这个会令人的精神、精力、思维和才情勃发的时日,于是,就有了上面这篇文字,是为序。

闻 一

2006年春花烂漫季节于北京南横陋室

### 序/1

### 凯歌年代

号角齐鸣——“战时共产主义”和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3

风卷红旗——“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思想/11

凯歌行进——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再探讨/20

面对小农——十月革命和农民与农业问题/28

计划的开端——列宁和全俄电气化计划/40

为权力而战——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最早的权力争斗/49

### “退却”年代

改变与转向——苏联 20 世纪 20 年代的新经济政策/61

农民需要自由——苏联 20 世纪 20 年代允许农民有选择土地使用  
形式自由的问题/73

换一种方式——苏联 20 世纪 20 年代的土地租佃和雇佣劳动  
问题/81

要不要有人先富起来？——是富农，还是走上富裕道路的农民？/94

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列宁和苏维埃俄国的租让政策/110

国家包办不了一切——略论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私营工商业政策和  
反对“耐普曼”的斗争/122

财主的真面孔——对“耐普曼”的再认识/153

放开手脚——苏联 20 世纪 20 年代工业管理体制的变革/161

一个被误解的概念——试析列宁有关“停止退却”的论述/170

### 剥夺年代

大转变——新经济政策是完善终结还是中止执行？/179



## 目录

- 直线前进——苏联的工业化/188  
高速前进——再说苏联的工业化/198  
廉价劳动力——“直接工业化”和对“劳改犯人”的利用/207  
怎样前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高速度和离心力/214  
谁决定命运？——斯大林的工业化是唯一的选择吗？/220  
争论的代价——“一国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历史进程/231  
换个战场——布哈林：我不愿看到那一天！/243

### 战争年代

- 炮火瞄准敌人——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经济/257  
为了胜利——苏联的战时经济和战时经济体制/264  
大国较量——独立和自由是风：关于历史上的西乌克兰问题/273  
为了战利品——琥珀光泽上闪烁着历史/281

### 战后年代

- 战后时分——对马林科夫评价之我见/291  
互不信任的三角——斯大林、蒋介石和毛泽东/300  
不是铁板——“社会主义阵营”说/307  
“玉米改革”——略论赫鲁晓夫的改革/315  
自留地和农机站——改组—战略进攻—回归/332  
苏美争锋一角——一场旷日持久的谈判/337  
伤心岁月——1964年10月：克里姆林宫的“宫廷政变”/343  
岁月沉浮——赫鲁晓夫为什么会下台？/354

《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总跋/358

凯歌年代



列宁明确地得出结论：“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遗憾的是，新经济政策对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来的土地纲领、农民与农业方面的政策所作出的修正，一开始就受到了干扰。列宁死后，修正过的历史又被重新修正过来。无产阶级国家要在新的基础上建设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乾坤”。全俄电气化计划就是恢复和重建国民经济的规范 and 标准，是一盏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指路灯，是一块砸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里程碑。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早期的权力之争，实质上显示并决定了其后他们两人间多年无情争斗的实质。



МАШ  
ПОСЧИ  
1000

## 号角齐鸣

——“战时共产主义”和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战时共产主义”作为一项政策已经得到比较广泛和深入的讨论。但作为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和方法,甚至途径,还远没有被全面地、批判性地探讨过。从在一个小农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个角度,来重新认识“战时共产主义”的成败得失,揭示出已经被半个多世纪的灰尘所掩盖,但不时被新时代的新问题冲击出火花的历史经验的真谛,将会是一件于我们有启迪意义的工作。

### 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否定

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否定,恰恰是对它作为一条建设社会主义必由之路的否定。在这方面,列宁从来没有使用过两分法,这是不少研究者有意或无意忽略了的。

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列宁多次分析了新经济政策以前的经济政策,对“战时共产主义”做了全面的否定。他在莫斯科第七次党代表会议的一段讲话集中仅反映了这种否定的实质内容。他说:

当时认为可以不经使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准备时期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曾经以为建立了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一个与以前不同的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制度。我们曾经以为,两种制度——国家生产和分配制度同私人商业生产和分配制度将互相进行斗争,并且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斗争:我们将逐步夺取敌对制度的生产和分配而建立起国家的生产和分配。

列宁的上述否定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不能用革命的方法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二是不能在无法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内,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国家生产和分配制度同私人商业生产和分配制度之间的矛盾。

列宁的用语是十分明确的,无论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说法,还是直